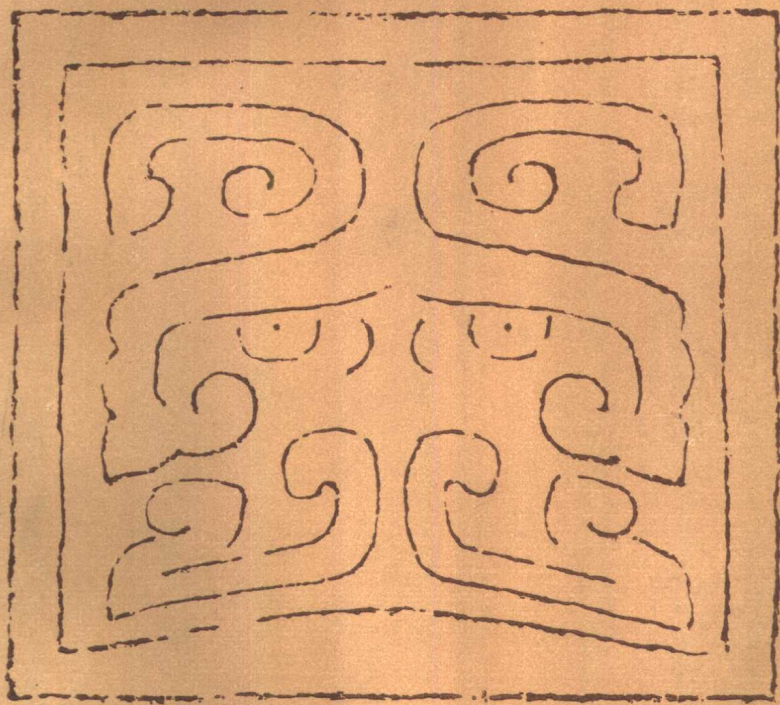


# 陈子昂诗注

彭庆生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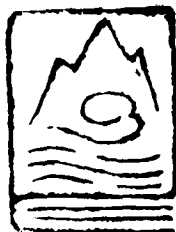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2 038 5378 5

彭庆生 注释

# 陈子昂诗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封面设计：陈世五

责任编辑：戴安常

**陈子昂诗注**

彭庆生注释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625 插页4 字数235千

1981年2月第一版

1982年6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7,301—22,900册

书号：10118·343

定价：1.22元

## 序

登上高峰的旗手是光荣的，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也是可敬的。

当李白、杜甫在诗国的顶峰引吭高歌的时候，当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他们都铭记着先驱者的功劳。李白称陈子昂为“麟凤”，杜甫赞子昂为“雄才”；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认为：唐兴以来，兼工著述和比兴者，唯子昂一人而已①。这些文学大师们的颂扬，陈子昂是当之无愧的。

### —

陈子昂（六五九——七〇〇），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今四川射洪县）人。出身于庶族地主。年轻时豪放任侠，十八岁始折节读书。二十四岁中进士。二十六岁诣阙上书，拜麟台正字。二十八岁从军，随乔知之北征同罗、仆固。三十一岁迁右卫胄曹参军。三十三岁以继母忧解官返里。服终，擢右拾遗。三十六岁陷冤狱，翌年狱解。三十八岁从武攸宜征契丹。四十

岁辞官归隐。久视元年（七〇〇），因武三思阴囑县令段简罗织诬陷，再度下狱，忧愤而卒，享年四十二岁②。

陈子昂是诗国的骄子，又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才能的人。他“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谏政理书》）；同时，他更密切地关注现实的政治、经济和边防问题。从登上政治舞台的那一天起，他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不断地上谏疏，上条陈，大胆地陈述自己的政见：

首先，他注意到了当时人民的疾苦。文明元年（六八四），当他还是布衣的时候，就曾大声疾呼：“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谏灵驾入京书》）。因此，他坚决反对把高宗的灵驾迁回长安，以免劳民伤财，危及唐帝国的统治。垂拱三年（六八七），他又在《谏雅州讨生羌书》中指出：“当今山东饥，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直至归隐前夕，他又在《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中提出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蜀中逃亡的农民多达三万余户，一部分逃户揭竿而起，“攻城劫县，徒众日多。”陈子昂认为：农民之所以逃亡和造反，“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这些情况，雄辩地说明：随着“贞观之治”的结束和“贞观老臣”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曾一度有所缓和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武则天时期，又逐渐尖锐起来了，并在不断地激化。陈子昂从维护地主阶级的长

远统治出发，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对水深火热中的农民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并认识到了“官逼民亡，官逼民反”的道理，这是他比其同时代的封建政治家高明的地方。然而，他也毫不隐讳其地主阶级的立场，骂起义农民为“劫贼”，这正是其沾沾自喜的“本为贵公子”的本色。

第二，痛斥酷吏，极谏淫刑。武则天为了夺取帝位，巩固自己的统治，残酷地镇压一切反对她的集团和个人。她“疑天下人多图己”，“欲大诛杀以威之”（《通鉴》卷二百三），故盛开告密之门，宠任周兴、来俊臣等一大批毫无人性的酷吏，使用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大搞特务统治，冤狱遍于国中。正如陈子昂所说：“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云”，“及其穷究，百无一实。”弄得“天下喁喁，莫知宁所”（《谏用刑书》）。以致朝臣们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诀别道：“不知重相见否？”（《旧唐书·酷吏传》）在这种血腥的恐怖统治下，陈子昂显示了他的胆略和远识。他懂得：这种恐怖统治，只能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空前激化，因而危及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用他的话来说，即“上观三代夏、殷、周兴亡，下逮秦、汉、魏、晋理乱，莫不皆以毒刑而致败坏也。”因此，他反对告密罗织，反对大兴冤狱，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酷吏们的罪恶用心和丑恶面目：“上希人主之旨，下以图荣身之利。徇利既多，则不能无滥，滥及良善，则淫刑逞矣！”（《谏用刑书》）

第三，主张加强边防，同时又反对黩武。武则天时期，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突厥、吐蕃频年入寇，烧杀掳掠，严重

地破坏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陈子昂曾两度从军，实地考察了西北和东北的边防情况，在《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和《上西蕃边州安危事》等表疏中，提出了一些确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如主张在甘州一带益兵屯垦，一则可以给西北边兵提供足够的军粮，二则可以扼守河西咽喉，以防吐蕃内侵。这种切实可行的国防措施，就决不是一般纸上谈兵的书生所能企及的。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穷兵黩武。垂拱三年（六八七）冬，武则天打算从雅州开山通道，出击无罪的生羌，因以袭吐蕃。陈子昂坚决反对，上书谏止，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受儒家“德政”思想的影响极深，有时过多地强调了“息兵”，以致不识大体。如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对屏障西北边疆和保证东西交通的畅通，都是很重要的；而陈子昂却在其著名的《谏雅州讨生羌书》中，对放弃四镇大唱赞歌，这显然是错误的。

第四，主张任贤，改革吏治。这方面陈子昂谈得很多，却鲜有新意。值得一提的是：他反复强调“贤不可疑”，指出武则天“外有信贤之名，而内实有疑贤之心”（《答制问事》），这倒是戳到了武氏的痛处。此外，如建明堂、兴太学等，则不过是封建时代的老生常谈。

总之，陈子昂的政治主张是：一方面任用贤才，改革吏治，安定民生，招抚流亡，反对淫刑，平息冤狱，实质上，就是企图缓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既加强边防，又反对黩武，以防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其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在某些

方面也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 二

陈子昂的一生，始终处于武则天当权的时代。因此，对武则天的态度问题，一直是千余年中封建文人争论的焦点。某些卫道士一口咬定子昂忠于武氏，因而是“名教罪人”，王士禛甚至破口大骂：“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矣，子昂真无忌憚之小人哉！”另一派则认定子昂忠于李唐，不遗余力地为之辩护昭雪，陈沆父子就是这一派的代表。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这种争论是可笑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陈子昂的政治主张是否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以及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不是看他忠于姓李的还是姓武的。然而，为了全面地了解陈子昂的思想发展和深入地研究他的作品——特别是《感遇诗》，就无法回避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态度问题。

陈子昂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适逢唐高宗病歿，武则天临朝称制。陈子昂上书，武则天亲自召见，颇加赞赏，授予官职，一时誉满东都，飞驰远迹。后来又数次召见，问以政事。因此，陈子昂一度对她怀有知遇之感，并期望依靠这位精明的皇太后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后来武则天称帝，他表示拥护，其主要原因，也仍在于此。然而，武则天却并不理解陈子昂，正如卢藏用《陈氏别传》所说：“上壮其言而未深知也。”她只欣赏陈子昂的文才，赞许他“地籍英灵，文称晔晔”，却并不看重他的政治抱负和经世之略。加以子昂的政见，往往与



武氏相悖；而他的直言净谏，尤难为刚愎的武氏所容，所以，“上数召问政事，言多切直，书奏，辄罢之”（《别传》）。多次的碰壁，使他对武则天逐渐失望了；特别是武则天在刑狱、边防、佞佛、用人等方面的弊政，诸武集团的骄奢淫逸，更使他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因此，当他以继母忧解官返里之后，在居蜀守制的二三年中，他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逐渐消磨，家传的道家思想逐渐抬头，佛教悲观厌世的思想也乘虚而入，归隐山林的念头已在他心中扎根。服终，他怀着矛盾的心情，吟着低沉的调子③，回到洛阳。虽然被提升为右拾遗，却“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志”（《别传》）。更不料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先是近两年的冤狱，使他亲身领略了武周政权的暴虐。幸而获释，他又振作精神，决心以身报国，再次投笔从戎。当前锋失利、举军震恐之际，他挺身而出，愿为前驱。然而，庸懦而刚愎的主帅武攸宜不仅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给他以降职的处分，把他赶出了参谋部。这致命的一击，使他丧失了对武周政权的最后一点希望和信心。在《与韦五虚己书》中，他沉痛地写道：“仆尝窃不自量，谓以为得失在人，欲揭闻见，抗衡当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谬异于此望者！”“夫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笔，雄笔，弃尔归吾东山，无汨我思，无乱我心，从此遁矣！”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书，也正是陈子昂与武周政权的绝交书。不久，他便毅然归隐了。然而，武周政权却并没有放过他，他终究惨死于武氏爪牙之手。

### 三

西晋以后，反动的门阀制度日趋严峻，文学上的形式主义逆流也日益泛滥。这几百年中，文学的形式和技巧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内容却十分贫乏：“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等而下之，则玄言诗以老、庄的词句掩盖欲火，不可卒读；宫体诗宣扬色情，更不堪入目。这期间，虽然南方出现了陶渊明、鲍照等优秀诗人，北方出现了《木兰辞》、《敕勒歌》等优秀民歌，但都无法扭转这种江河日下的颓势。文艺理论家刘勰、钟嵘也曾对这种形式主义文学进行过批判，但他们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影响也不大，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宇文泰命苏绰模仿《尚书》撰《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但这种不合时宜的模拟和复古，注定是要失败的；隋文帝想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改革文风，成效也不显著。因此，直至唐初，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形式主义的文学：文则骈俪浮华，诗则绮错婉媚。虽然“初唐四杰”力求跳出六朝的窠臼，扩大诗歌的题材，他们的优秀之作，给窒息已久的诗坛带来了一股生意盎然的春风；但他们还没有提出一个旗帜鲜明的革新纲领，他们的创作，也未能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因此，他们还不能掀起一场摧陷廓清的革新运动。这个任务，落到了陈子昂肩上。

陈子昂的理论和创作，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唐帝国政治上的空前统一和强大，经济上的迅速恢复

和发展，曾长期垄断政权的豪门贵族的势力逐渐削弱，大批中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以及文学本身日益发展的形式技巧和长期贫乏的内容之间的尖锐矛盾，都要求文学——首先是作为当时主要文学形式的诗歌来一场革命，以扫清文学发展的障碍，开辟通向顶峰的道路。陈子昂具有进步的政治理想和积极的政治态度，敢于正视现实，同情人民疾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顺应历史的要求，首先树起了诗歌革命的大旗。

《修竹篇序》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纲领。在这篇短文中，他深刻地指出：晋宋以来的形式主义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即片面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大量的典故，而毫无社会内容，更没有理想的光辉，正如白居易所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与元九书》）。因此，陈子昂振臂疾呼：“风雅不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就是说：统治诗坛近五百年的形式主义逆流，完全背弃了《诗经》到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这发聋振聩的呐喊，实在是唐诗革新的第一声春雷。针对六朝淫风的痼疾，陈子昂大力提倡“汉魏风骨”，即“建安风骨”，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讴歌进步理想，同时，务求气势飞动，韵调铿锵，光彩照人，从而达到进步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即所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见，陈子昂标举复古，其实质乃是革新。他的《修竹篇序》，就是扫荡形式主义颓风的檄文，也是把唐诗引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峰的进军号。

陈子昂的作品，多有散佚④。今日所存者，仅有诗一百二

十七首，文一百一十余篇。

陈子昂是杰出的诗人，也是优秀的散文家。陈文的成就及其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巨大影响，几乎是唐代古文家一致公认的。但在这篇短序中，我只能简略地介绍他的诗歌。

陈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感遇诗》三十八首和《登幽州台歌》。

这三十八首《感遇诗》，显然不是一时一地之作，其中大部分都作于后期，即归田前后。然而，从今传《感遇诗》的编次来看，既不是按内容排列，也不是依年代编排。倘由诗人自己编定，该不至于如此杂乱。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说：“良友歿矣，天其丧予！今采其遗文可存者，编而次之，凡十卷。”这《感遇诗》三十八首，大概也是陈子昂死后，由卢藏用编定的。

《感遇诗》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它抨击了武则天时期的多种弊政。如第十九首《圣人不利己》，痛斥武氏恣意挥霍民脂民膏，大肆建造宏伟精丽的庙宇佛像，用以愚弄社会，麻醉人民；第九首《圣人秘元命》，揭露谶纬之学的欺诈，讥刺封建统治者的愚蠢，其矛头，亦直指武则天；第二十六首《荒哉穆天子》、第二十七首《朝发宜都渚》、第二十八首《昔日章华宴》，皆借古讽今，谴责武则天和诸武集团纵情享乐，荒淫无度；第十二首《呦呦南山鹿》、第二十一首《蜻蛉游天地》鞭笞武则天大兴冤狱，厉行恐怖统治；第二十四首《挈瓶者谁子》刺当时宰相智小谋大，力微任重，虽烜赫一时，然祸不旋踵；第十首《深居观群动》等活画出世

人蝇营狗苟、尔虞我诈的丑态。特别是第三首《苍苍丁零塞》、第二十九首《丁亥岁云暮》、第三十四首《朔风吹海树》、第三十七首《朝入云中郡》等边塞诗，一方面热烈歌颂士兵们的爱国精神，另一方面谴责武后不赏边功，使浴血奋战的将士终生饮恨；一方面强烈反对武后出击无辜的兄弟民族，另一方面又抨击武后不修边备，不用名将，因而不能制止好战的游牧民族的侵扰。这些，后来都成为唐代边塞诗的基本主题，陈子昂已开其先声。而且，诗人总是把统治者的失策和人民的苦难直接联系起来，因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肉食谋何失，蓁蕞纵纵横。”“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这些不朽的名句，和李白的“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古风》第十四）、高适的“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杜甫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兵车行》），皆异曲同工，先后辉映。

其次，《感遇诗》塑造了诗人自己的正面形象。在第十一首中，他以“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的鬼谷子自况，豪迈地宣称：“岂图山木寿，空与麋鹿群！”他不过是养晦待时，以期施展经世济时之略。显然，这是诗人出仕前的自我写照。在第三十五首中，他高歌“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这慷慨报国、雄姿英发而又带着明显的阶级烙印的形象，代表着诗人从政初期的精神面貌。然而，他逐渐发现：武则天并不是他所期望的“圣人”。他的理想，被黑暗的现实击得粉碎。他痛恨那“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

“谗说相啖食，利害纷嘒嘒”的浊世，却又深感自己无力回天，因而忧心如醉：“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那腥风血雨的恐怖统治，更使他常有忧生畏祸之思：“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他原想效法功成身退的范蠡和鲁连，后来却羡慕永无罗网之灾的青鸟和玄凤：“瑶台有青鸟，远食玉山禾。昆仑有玄凤，岂复虞云罗？”他既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又不能力挽狂澜，只好归隐山林，以葆孤芳。然而，满腔的孤愤，深沉的苦闷，使他决不能停止歌唱，《感遇》其二便是他归隐后的代表作。诗人以幽香的兰、若，象征自己的美德和才华，而“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则寄寓着志业未成、理想幻灭的忧伤。

综上所述，可见陈子昂的《感遇诗》，在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等方面，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不仅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诗人，而且也超过了阮籍的《咏怀》。钟惺说：“其韵度虽与阮籍《咏怀》稍相近，身分铢两，实远过之。俗人眼耳贱近贵远，不信也。”可谓知言。

除《感遇诗》外，陈子昂两度从军，都写下了一些优秀的诗篇。如《题祀山烽树赠乔十二侍御》：“汉庭荣巧宦，云阁薄边功。可怜骢马使，白首为谁雄！”抨击武则天宠用钻营取巧的佞人，压抑刚正不阿的志士，锋芒毕露，言简意深，在初唐是不可多得的。《蓟丘览古》七首和《登幽州台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前者通过凭吊古迹，缅怀前贤，以抒发诗人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感慨。其中《轩辕台》一首，是慨叹自己不遇轩辕盛世，不见至道之治。显然，诗人膜拜黄帝的英灵，正是他不满于武

周政权的表现。《燕昭王》慨叹礼贤下士的明君，早已一去不返。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这痛彻肺腑的呼喊，不正是对武则天鞭挞吗？《郭隗》中的“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这又是多么自负而愤懑的心声。最使人一唱三叹的，还是《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今古茫茫、天地悠悠的慨叹中，蕴含着诗人的政治理想 and 黑暗现实的深刻矛盾，高度地概括了封建时代许多有才能的志士的共同悲剧。黄周星说：“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泣鬼。”

此外，《度荆门望楚》描绘自蜀入楚的山川景色，虚实远近，各尽其妙；《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写秋夜幽景，宛然如画；《岷山怀古》通过对诸葛亮和羊祜的缅怀，以抒发其建功立业的壮志；《送东莱王学士无竞》、《春夜别友人》都洋溢着真挚的友情；《送客》语浅情深，清新秀丽；《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则雄浑苍劲，豪气凌云。这些，都是陈诗中的佳作。

总之，陈子昂的优秀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战斗精神，他不愧为初唐诗坛的佼佼者。但也必须指出：对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对于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作为一个政治家，陈子昂是有所关注的，并在《上蜀川安危事》等文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史料；然而，在现存的陈诗中，却很少有这方面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至于陈诗的某些篇章，还宣扬了治乱循环的唯心史观，夹杂着一些道家和佛教的消极思想，这也是应当批判的。

在艺术上，陈子昂继承了《诗经》和屈赋的比兴手法，那幽芳的兰、若，坚贞的修竹，昆仑的瑶树，北堂的萱草，美丽的翡翠，自由的白鸥，神话中的青鸟和玄凤，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诗人的情操或愿望的化身。他倡导“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他的诗，也确是师法曹、刘慷慨悲壮、雄浑苍劲的格调，吸收阮籍深沉蕴藉的优点，从而形成了自己雄浑沉郁、刚健质朴的风格。他的揭露社会矛盾、抨击朝政腐败的诗篇，无疑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而其歌唱理想、抒写愤懑的作品，则闪耀着浪漫主义的光彩。

陈子昂最擅长五古。他的五古，不仅远出初唐诸人之上，而且在近三百年的唐代诗坛上，也是比较杰出的。高棅编《唐诗品汇》，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却破例将陈诗列为“正宗”，是独具只眼的。同时，他的五律也很出色。如《白帝城怀古》、《岷山怀古》、《度荆门望楚》、《晚次乐乡县》、《送魏大从军》、《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等，皆格高语壮，雄浑自然，无纤巧雕琢之弊。因此，方回说：“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天下皆知其能为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殊不知律诗极精”。

但总的看来，陈诗毕竟还质胜于文，形象还不够丰富，技巧也未臻纯熟，形式也不够多样。在他现存的作品中，既没有乐府诗，也没有七言诗。而当时，七言诗已日趋成熟，并已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子昂竟未暇一顾。这些，都是陈诗艺术上的缺点。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



是：他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创作实践中，只强调继承“风雅”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而相对地忽视了创新。正如叶燮所说：“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失自家体段。”黄子云也曾指出：“所嫌意不加新，词稍粗率耳。”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同时，陈子昂对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批判，固然是完全必要的，十分深刻的；但他忽视了向晋、宋以来的优秀诗人学习，未能博采众家之长而自铸伟辞，这正有待于后起者的努力。

尽管陈子昂的诗在内容上和艺术上都有明显的局限，但他的历史功绩和巨大影响是举世公认的。他以旗帜鲜明的理论，闪耀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光辉的诗篇，初步扫荡了统治诗坛数百年的靡靡之音，开拓了唐诗健康发展的道路，并成为李白、杜甫攀登顶峰的基石。诚如高棅所说：“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因此，胡震亨、沈德潜都把他比作“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的陈胜、吴广。平心而论，实非过誉。

我原想将子昂诗文一并注释，但近年忙于别的工作，未能如愿。明年是子昂逝世一千二百八十周年，姑且先将诗注整理付印，也算是一点纪念。我学殖浅薄，注释陈诗，实难胜任。幸蒙刘开扬同志和陈新同志审读初稿，热情赐教，使我得以改正许多谬误；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精心审校，多所指正；我院图书馆任效如等同志热情提供资料，使本书得以完成。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还存在许多缺点错误，亟盼专家、读者指教。